

中国当代文学教程

上册

主编 李友益 刘汉民 熊忠武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教程

(1949——1986)

上 册

主 编

李 友 益

刘 汉 民

熊 忠 武

长江文艺出版社

顧 问 王庆生
主 编 李友益 刘汉民 熊忠武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毛汉生 方楚勤 刘汉民*
汤全福 李友益* 肖向东*
汪昌松 胡志伟 黄仁光
熊忠武* 熊家良*
(带*者为常务编委)

目 录

第一讲	绪论	1
第二讲	十七年的文艺运动与文学创作	19
第三讲	十七年的小说创作	38
第四讲	赵树理、马烽和李准的小说	53
第五讲	峻青、王愿坚、茹志鹃的小说	64
第六讲	梁斌、杨沫与罗广斌等的小说	75
第七讲	柳青、周立波的小说	91
第八讲	杜鹏程、吴强和曲波的小说	104
第九讲	十七年的诗歌创作	118
第十讲	郭小川、贺敬之的诗歌	134
第十一讲	闻捷、李季、李瑛的诗歌	148
第十二讲	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的诗词	161
第十三讲	十七年的散文创作	176
第十四讲	杨朔、刘白羽的散文	188
第十五讲	秦牧、吴伯箫的散文	203
第十六讲	冰心、碧野等的散文	218
第十七讲	十七年的戏剧创作	232
第十八讲	老舍、曹禺的剧作	245
第十九讲	田汉、郭沫若的剧作	257
第二十讲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	271

第一讲

绪论

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的时候，中国人民革命的光辉历程，便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时期。与此同时，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也就揭开了当代文学的崭新篇章。

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继续和发展。发端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中国现代文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它在三十年间，形成并坚持了文学革命性、战斗性的光荣传统，开创并发展了有别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学形式和表现方法，运用并提高了白话文这一语言工具，并且培养和造就了一支由多种成分组成的、数量可观的创作队伍。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又在解放区文学中开始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这一切，都为当代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了现代文学，它的性质，就其主体而言，已经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文学。这不仅为由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也为当代文学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艺术实践所体现。

由于中国当代文学新的社会主义性质，使它具有了一系列与前迥异的鲜明特征。

第一，中国当代文学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

解放以后，处于执政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从思想、政治、组织乃至创作等各个方面，对文学事业进行了全面领导。党为人民文艺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还经常注意纠正文艺领导工作中的失误和偏差，以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党号召并组织全体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使其逐步自觉地运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文艺创作和研究，抵制和批判各种错误的文艺思潮，以保证我国的文艺事业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文艺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党还号召和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参加各项政治运动，投身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深入工矿、农村、部队和其他社会领域体验生活，推动作家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使作家取得丰富而生动的创作源泉。此外，党还注意不断改善作家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给作家们提供一个较好的创作环境，并采用多种形式和方法，培养和提高作家队伍，扶植新生的文学力量，奖励优秀的文学创作，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当代文学，才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

第二，中国当代文学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最高宗旨。

建国前夕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确定了以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我们文艺

工作的方针。几十年来，我们的作家都在为贯彻执行这一方针而努力工作。他们深入生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向人民群众学习，从人民无比丰富的生活、劳动和斗争中吸取从事文学创作的营养和激情，获得战胜困难和厄运、追求美好事物和光明前途的信心和力量。他们热情地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讴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新生事物和先进人物，揭露和鞭笞社会生活中落后和丑恶的现象，并不断拓展文学的表现领域，增加文学的艺术样式和表现手段，提高文学的艺术水平，以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精神生活的需要。我们看到，文学还从来没有拥有过如此众多的读者。而且，在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广大劳动人民及革命者已经占有了主要的位置。与以往的进步文学不同，在当代文学中，劳动人民不再仅仅是被怜悯、被启迪的对象，他们的生活、劳动和斗争得到了较充分的展示，他们巨大的历史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得到了较充分的表现，这使他们在文学中的地位与其作为历史主要缔造者的地位逐渐相称。同时，我们的文学不仅注意从人民群众中发现、培养和吸收专业作家，而且注意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文学创作。新中国的作家队伍中，大量是从工农兵和其他岗位的知识分子中涌现出来的，而无以数计的业余作者也是文学创作力量的重要成分和作家队伍的强大后备。我们的民间文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人民群众更好地利用文学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实行自我教育、自我娱乐，为生活和斗争服务，出现了一些很好的作品。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发生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便是人民群众利用文学形式进行政治斗争的光辉范例。这一切，都是当代文学贯彻执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义服务正确方针的可喜收获。

第三，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经历着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但仍然具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不断走向成熟、走向繁荣。

毋庸讳言，由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的失误，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道路是十分不平坦的。它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风波和劫难，受到了极大的压制与阻碍，不少作家和评论家牺牲了几十年的青春甚至宝贵的生命。

但是，由于有党的领导，由于与人民群众有血肉联系，也由于作家们献身人民文学事业的坚强信念，我们的文学仍然呈现着强大的生命力。总览四十年的文学史，我们看到，党的领导在逐步改善，文学运动的指导方针在逐步端正，作家队伍日益壮大，文学创作日益繁荣，题材领域明显拓展，艺术水准明显提高。我们的文学充满了活力和希望。

就拿创作方法来说，我国当代文学大多使用革命现实主义方法。但这种方法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凝固的，而是发展变化的。新时期尤其如此。一方面，它容许其他创作方法与自己同时共存，各显其能；一方面又从其他创作方法中吸收有益的东西，丰富和发展自己。正因为如此，它就能继承和借鉴古今中外所有进步的革命的文学的优秀遗产，不断更新自己的文学观念，发展自己的艺术实践。

同时，各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也给当代文学的发展以巨大动力。解放前，各兄弟民族的文学，总是处于被压抑甚至被消灭的艰难境地。解放后，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经过各兄弟民族文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国各民族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丰富和

繁荣了祖国的文学百花园。这是我国文学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个充分的体现。

中国当代文学近四十年的历史，如果放在今后更长时间的文学发展史中去考察，将可以视为整个社会主义文学的发轫阶段。但从目前的文学演变来把握，我们仍然可以根据文学发展道路所显示出来的阶段性，把它划分成几个时期来研究。

一、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发生前夕的十七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开拓与初步兴盛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虽然受到了“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潮的各种干扰，发生了不少严重的失误和挫折，但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创作在曲折的道路上还是得到了初步的繁荣。

建国初期，我们的文学为歌颂新中国的诞生，为歌颂社会主义改造和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为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献上了第一批创作成果。“颂歌”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基调，它充满了欢乐、明快的色彩，洋溢着时代的战斗激情。其中，虽然有一些成功的作品，但就总体而言，题材比较窄狭，主题比较单一，内涵比较浅露，艺术比较稚嫩。

一九五九年前后，文学出现了一个初步繁荣的阶段。这一阶段，文学发展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一九五八年轻率的“大跃进”，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六十年代初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对所谓修正主义思潮的批判等等，都极大地阻碍了文艺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尽管如此，由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影响，由于“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热情，也由于六十年代初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更由于作家在思想艺术上的积

累和提高，文学还是取得了可喜的丰收，以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就为标志，诗歌、戏剧、散文都涌现了一批令人瞩目的作品。小说《创业史》、《红旗谱》、《青春之歌》、《红日》、《红岩》、《李自成》（第一卷）、《我的第一个上级》、《在和平的日子里》、《百合花》，戏剧《茶馆》、《蔡文姬》、《关汉卿》，以及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等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从这些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我们文学的表现领域有所扩展，思想内涵有所深化，艺术水准有所提高，不少作家创作上日趋成熟，形成较鲜明的艺术风格。

不了一九六二年以后，“左”倾思潮愈演愈烈，导致文学的道路愈来愈窄，创作也愈来愈拘谨、单调，收获较少，最后便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

二、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我国当代文学惨遭荼毒，受到严重挫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集十七年“左”倾错误之大成，并将其恶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奉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以《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反动文艺纲领，残酷迫害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把几乎所有的革命文艺作品打成毒草，肆无忌惮地剥夺广大人民阅读和欣赏文艺作品的权利，使文艺园地满目疮痍，一片凋零。一九七六年以后，曾产生过一些文学作品，但好的作品很少，“帮八股”和受“帮八股”影响的作品充斥着仅有的一些书刊。更有甚者，“四人帮”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他们公然推行阴谋文艺，使文艺沦陷为他们的反动政治工具。但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并没有屈服，他们在逆境中思索，由迷惘而逐步觉醒，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不妥协屈服，不同流

合污，用各种方式，乃至鲜血和生命同林、江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直至爆发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天安门诗歌运动”。

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期。七十年代后期，是当代文学的恢复阶段，在这一阶段，文艺战线揭批了“四人帮”的罪行，推翻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纠正了冤假错案，恢复了各级文艺机构和刊物，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文学创作出现了大量真实地反映现实的好作品，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产生了巨大的战斗作用和社会效益。进入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的确立和贯彻，文学战线充满了生命活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局面。文学开始实现本体的回归，文学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文艺思想空前活跃。文学创作突破了旧有的诸多藩篱和禁区，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反思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为审视中华民族的深层意识，并参与社会主义现实的变革实践，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新时期文学一方面继承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学传统，一方面广泛借鉴外国的有益的经验，在艺术形式、艺术手法等各方面开展了大胆的探索和试验，使文学创作呈现出多元并峙，多样化发展的初步繁荣景象，预示着文学创作一个新的高峰即将到来。

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我国当代文学取得了显著成就，产生了一批优秀作品，培养了一批作家、批评家和理论家，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教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先说文学创作的成就。

作为文学发展水平标志的长篇小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硕果。十七年中的《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红岩》、《青春之歌》、《三家巷》、《上海的早晨》等都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新时期里，《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将军吟》、《芙蓉镇》、《沉重的翅膀》、《花园街五号》、《黄河东流去》、《钟鼓楼》等又有新的突破。此外，以《李自成》为代表的一批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也别具异彩。这些小说，为我国的文学画廊，增添了一系列的生动的人物形象。朱老忠、梁生宝、周大勇、杨子荣、江竹筠、林道静、许茂、胡玉音、徐秋斋、梁三老汉、张灵甫、陈文雄以及李自成、张献忠、崇祯等，都闪耀着艺术的光辉。

中篇小说在十七年中是个薄弱环节，成绩不大，《铁木前传》、《在和平的日子里》等是其中的佼佼者。到了新时期，中篇小说异军突起，收获巨大。《人到中年》、《天云山传奇》、《高山下的花环》、《人生》、《棋王》等都赢得了读者的青睐；陆文婷、罗群、梁三喜、高加林、王一生等形象都能引起人们深沉的思考。

短篇小说的数量尤其喜人，质量也不断提高。《登记》、《“锻炼锻炼”》、《我的第一个上级》、《黎明的河边》、《党费》、《百合花》、《山那面人家》、《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陈奂生上城》、《西线无战事》、《爱，是不能忘记的》、《乡场上》、《春之声》、《我是谁》、《受戒》、《内奸》等等，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诗歌创作的成绩也十分可观。抒情短章无以数计，其中

形神兼美者为数不少。长篇抒情诗从《致青年公民》、《放声歌唱》到《一月的哀思》、《小草在歌唱》、《光的赞歌》，也有长足的进步。长篇叙事诗为诗人们所重视，数量之多可谓空前，《杨高传》、《复仇的火焰》、《将军三部曲》等是其中的代表。“天安门诗歌”在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功勋，而新时期的诗歌新潮则在诗歌艺术上开了新局面。

戏剧创作也出现了一些优秀剧目。话剧有《龙须沟》、《茶馆》、《关汉卿》、《蔡文姬》、《霓虹灯下的哨兵》、《丹心谱》、《陈毅市长》等等。近年出现的一批探索戏剧也引人注目。戏曲有改编得十分成功的《十五贯》，新编历史剧《谢瑶环》、《李慧娘》、《海瑞罢官》，京剧现代戏《红灯记》、《芦荡火种》等，歌剧有《洪湖赤卫队》、《江姐》、《刘三姐》等。这些作品都受到普遍的好评。

新中国的散文起步较早，六十年代初出现了一个高潮，中间一度萧条，八十年代又有新进展。《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小桔灯》、《我热爱新北京》、《天山景物记》、《第二次考试》等是五十年代的宝贵收获。《雪浪花》、《长江三日》、《花城》、《记一辆纺车》、《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等，是散文丰收的硕果。巴金的《随想录》、丁玲的《“牛棚”小品》、杨绛的《干校六记》等是新时期散文创作的新成绩。

当代的报告文学自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首开新篇，五、六十年代陆续出现了不少作品，但作为时代的纪录、历史的见证，它受到的局限太多。新时期的报告文学有了一个大的发展，数众质高。《哥德巴赫猜想》、《大雁

情》、《船长》、《祖国高于一切》、《中国姑娘》、《唐山大地震》等等都写得十分成功。近时，报告文学的反映领域和表现手段，又有了较大的拓展。

少数民族的文学也取得了重大成就。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在茫茫的草原上》、康朗甩的叙事长诗《流沙河之歌》、李乔的小说《欢笑的金沙江》、陆地的长篇《美丽的南方》、韦其麟的叙事长诗《百鸟衣》、益布单增的长篇《幸存的人》等都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各民族文学遗产的发掘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拉斯》等三大史诗相继被发现并得到整理。其他如蒙古族的《嘎达梅林》、撒尼族的《阿诗玛》、壮族的《百鸟衣》、阿细族的《阿细先基》、傣族的《召树屯》等等都放出了美丽的光彩。

近四十年来，通过大量的艰巨的文学创作实践，并经过激烈的反复的社会斗争和政治考验，我们培养、锻炼和造就了一支庞大的作家队伍。按照丁玲的说法，我国当代作家现在是“五世同堂”，人才济济。

第一代是“五四”运动前后至大革命期间（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出现的作家，他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其中已经去世的郭沫若、茅盾、田汉、老舍等，曾为新中国文艺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仍然健在的冰心等人还在继续写作。

第二代是大革命失败至抗战前（一九二七——一九三七）这一时期出现的作家。其中有冯雪峰、蒋荃麟、周立波、丁玲、周扬、夏衍、张天翼、曹靖华、胡风、沙汀、欧阳山、

艾芜、萧军、艾青、姚雪垠、周而复、草明、舒群、骆宾基、刘白羽、光未然、陈荒煤、曹禺、卞之琳、萧乾、冯至、吴组缃、严文井、沈从文等人。在解放后，他们有的担任领导工作，身负重任；有的致力创作，硕果累累；有的一身而二任焉；有的因政治的或艺术的原因长期搁笔，复出后再度活跃。他们年事已高，虽然不少人已先后辞世，但健在的人仍壮志满怀，誓为振兴中华贡献出最后一份力量。

第三代是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出现的作家。其中有赵树理、柳青、梁斌、马烽、西戎、秦兆阳、孙谦、康濯、陈登科、吴强、魏巍、曲波、胡可、郭小川、三季、闻捷、贺敬之、田间、严辰、杨朔、孙犁、秦牧、陈残云、陈涌、冯牧、萧殷、黄秋耘等等，他们大多接受过革命战争和革命工作的锻炼，是新中国文学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代。

第四代是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一九四九——一九六六）这一时期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一代。其中有杨沫、罗广斌、杨益言、杜鹏程、茹志鹃、刘真、柯岩、邓友梅、白桦、刘宾雁、李准、王蒙、公刘、李瑛、从维熙、林斤澜、刘绍棠、陆文夫、高晓声等人。他们有不少人曾被错划为右派或反党分子，耽误了十年、二十多年的时间。他们是新时期文学创作队伍的中坚。

第五代是打倒“四人帮”以后涌现的一代。其中有刘心武、蒋子龙、莫应丰、古华、周克芹、张洁、谌容、贾平凹、李存葆、莫言、阿城、王安忆、舒婷、陈祖芬、高行健、沙叶新等等，他们勇于探索，敢于创新，是我国文学大有希望的一代。

可以预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国的作家队伍，不仅在数量上将继续增加，而且质量上也会继续提高，这是当代文学进一步成熟和繁荣的必备条件。

我国当代文学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取得十分重要的成就，因而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极为丰富而深刻。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对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促进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第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来观察、分析和处理文艺事业中的各种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过去却常常违反这一点。如对文艺工作和文艺工作者的评价，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毛泽东曾说，“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周恩来也说，“文艺工作是精神劳动，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又指出：“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然而，后来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却一直将多数文艺工作者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待。六十年代初的调整时期，周恩来、陈毅曾出面对此进行纠正，批评指出这是犯了“战略方针”的错误，但不久众多文艺工作者又被打成修正主义势力、裴多菲俱乐部，“文化大革命”更被打成黑线人物、黑帮分子等，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受到普遍伤害乃至严重摧残。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个问题才得以澄清。

对于文艺工作，一九五八年曾说新民歌是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文艺”的荒谬口号。六十年

代中期，却说文艺部门社会主义改造收效甚微，被死人统治着。这种忽高忽低的评价，都是脱离实际的。据此而提出的政策和采取的措施，必然是错误的、有害的。

辩证唯物主义反对片面性、极端化，而我们不少人却好走极端。例如，提倡写重大题材，就赞成题材决定论，而反对题材决定论时，又搞题材无差别论；提倡写英雄人物，就反对描写芸芸众生，而主张写普通人物时，又搞非英雄化乃至反英雄化；提倡歌颂光明，就反对揭露黑暗，而主张揭露黑暗时，又讨厌歌颂光明；提倡现实主义，就反对其他创作方法，而主张创作方法多样化时，却又否定现实主义；主张反映现实，就反对表现自我，而主张表现自我时，就反对描写现实。……这种片面性的文学观点，曾给我们的文艺事业带来巨大的危害。

和其他革命工作一样，文艺工作也会出现失误和偏差，但是，事物都有一个数量和质量的界限，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不能混淆界限，无限上纲。认识问题、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政治问题、敌我问题，应当一一辨明，不能躐等越级；艺术问题、学术问题、技巧问题、方法问题、动机问题、效果问题，都应当恰如其分的加以分析。如果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原则，不顾事物的界限，必然造成不良后果。

“左”右倾是表示政治斗争、路线斗争的术语，不应当轻易用到文艺斗争中来。即使真的产生了“左”的和右的错误，也应当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实事求是；而且，反右防“左”，反“左”防右，不走极端，注意分寸，讲究节制。根据几十年的斗争经验，反“左”防“左”仍要花更多气力。